

战争体验与历史意识

〔日〕田中正俊* 栞成显摘译

我生于 1922 年(大正十一年)。这一年,因华盛顿会议而开始裁军,也是因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的签订,而决定保全中国主权,实行门户开放,在中国之列强机会均等,以抑止日本扩张的一年。第二年即 1923 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接着 1925 年,男子普通选举法和蹂躏基本人权的治安维持法同时被公布。从此以后,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萧条。1927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1929 年 10 月,从纽约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1930 年终于波及日本。生丝以及出口总额,比上一年激减 34%,农产品价格暴跌,以日本东北地区为首的各地农民陷于贫困,出卖女儿的报道每天见报。人们称之为“昭和危机”。我的少年时代所处的日本社会,已陷于极端的萧条。于是,想依靠对外侵略,来打开国内的这种不景气局面。

1931 年 9 月,由于日本关东军的冒险主义阴谋,在柳条湖挑起了所谓“满洲事变”。我当时八岁,上小学三年级。而当 1937 年

*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等,又著《战争·科学·人》,多次撰文批判日本政界某些人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行径。本文原为作者于 1995 年 1 月 26 日在神田外语大学的最终讲义,载《独协经济》第六一号,发表时略有增删。其后,作者又发表了《关于所谓“学生出阵”》(载“不战士兵会”机关杂志《不战》第八六号,1995 年 5 月),及《关于战争责任的历史性继承》(载《历史评论》第五四五号,1995 年 9 月)两篇论文。后文从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主张一般认为现代法上没有直接责任的战后出生的日本“战后一代”,作为继承日本历史和文化遗产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负有责任的。——译者

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我14岁,上中学三年级。其后,战火扩大,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珍珠港及对马来半岛的奇袭攻击,终于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环。

我于1943年9月末,在旧制的高中学校毕业(三年提前为二年半)。然后在12月,进了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这一年,因废止了对文科学生的延缓征兵制度,二个月后,按1943年12月的所谓“学生出阵”为区别于一般士兵的“出征”,对学生特别使用了古日语中的“出阵”一词。——译者)之令,被迫放弃学业,作为一个士兵,加入了福井县敦贺的步兵联队。1944年9月6日,由大阪港开赴战场。装载了几万人部队的17艘船的运输船队,连夜间也要受到鱼雷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千难万险到了马尼拉,能够看到世界上少有的马尼拉湾落日景色的,就只有其中的三艘了。而当1944年12月22日,离开那已被化为人间地狱的马尼拉时,由十二艘船组成的开向新加坡的船队,又遭到鱼雷袭击、潜水艇炮舰轰击和飞机机关枪扫射的激烈攻击。最后在一天黎明,只剩下三艘逃进了台湾的高雄。其中一只,就是我所乘坐的。这一天,已是1944年的岁末了。

这期间,主要是在菲律宾群岛和台湾的战场上,我患上了心脏型脚气、伤寒、阿米巴赤痢、疟疾等重病,住进了马尼拉陆军医院和其他医院。由于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一米八的大个子,最后瘦得体重只有40公斤了。当我从马尼拉陆军医院出院时,是用四肢匍匐在楼梯爬上爬下的。到1945年战败后的第二年,23岁的我生还回到日本,前后共经历了四年的军队生活。就我个人来说,乃是蒙受命运的恩宠,免得一死,今天才能这样跟大家谈话。

战败后的第三年,即1947年,简直就象浦岛太郎(浦岛太郎,又称浦岛之子。日本传说:浦岛太郎是个渔夫,他在乌龟的带领下,下到海里,在龙宫过了三年的豪华生活后,又回到了故乡人间。可是,这时故乡的世界已经不知过了多少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了。——译者)似的,在东京大学复了学,重新过了三年的学生生

活,于1950年27岁时毕了业。所以,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渡过的。以上,便是我个人的战争体验梗概。

然而,下面暂不想就我个人自身的“战争体验”再多说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种“战争体验”,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体验而已,当时确实还存在着几千万、几亿人的,各自痛切的战争体验。而且,在这些人的体验之中,还包含着包括整个亚洲的牺牲者在内的,那些业已不能诉说的,无数死者的想法和愿望。

我们的这种“战争体验”,每每与所谓“学生出阵”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学生兵的战争体验”。我想诸位之中,有人会在记录影片中,或在电视中,看到1943年10月21日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体育场举行的所谓“学生出阵”壮行会的场面的。可是,就从这个画面上所摄下的“壮行会”之时起,直至战败,曾有着非常沉重的、严酷的历程,对这一事实,我想是绝不可忘记的。问题是,只把那在雨中分列行进的人们,单单作为悲剧的牺牲者、悲壮感的对象来看,或作为那样的人来进行缅怀,这是不成的。包括我在内,他们并不是单纯的被害者,毋宁说他们本身是准备作为加害者而被送上战场的,即从此时开始,造成悲剧,这种严酷的现实从这一天之后就继续下去了。

1993年12月,因为是所谓“学生出阵”五十周年,很多人举行了“学生出阵五十周年”的集会。但是,当策划这种“学生出阵五十周年”活动之际,有几个问题似乎应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前提。

第一,因“学生出阵”而被征兵的学生,一般说是十万至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只是现在估计的一个大概数字。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的日本,在战后处理问题上怠慢的一个大问题。例如,在我也是其中一员的菲律宾吕宋岛战场,关于那里的“出阵学生”,曾在菲律宾战场呆过的法政大学校长阿利莫二氏所著《吕宋战——死之谷》(岩波新书)一书中,有如下叙述:

投入吕宋岛千名以上的学生兵,其生还率恐怕不超过百分之

十。附带说一下,整个菲律宾群岛之战的 日本军 阵亡者有五十万以上。这超过了满洲事变以来在中国大陆阵亡者的数字。其中吕宋岛的阵亡者有二十万以上,在短期内有如此之多的阵亡者是别无他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最大阵亡者的菲律宾群岛之战,其全体兵员的生还率约为百分之二十三。

我,可以说是由于命运的恩宠,被菲律宾战场上的死神放过了,如今才活在世上,因此,对于我来说,使用“学生出阵”这个词,不管怎样,对那些一同前往菲律宾、作为“尖刀队”而战死的友人 A 君、K 君等,以及甚至是所有阵亡的学生兵,对他们总是包含有“负疚”的情感的。而且,这种“负疚”,还藏着一种羞耻感,即,现在活着的我,还可以对那些不能生还的人说多少话呢?甚至想,我已经没有对死者说话的资格了,这一严肃的回想,总是使我在这个话题上踟蹰不前。

第二,若对“学生出阵”本身的本质问题加以深入思考,把它放在社会之中去,则有下列问题。按一般说法,当时,日本政府所动员的士兵累计总数超过 720 万,其中派往国外的兵员数为 360 万人。又,“满洲事变”以后的战亡士兵总数是 230 万人,他们都是被迫离开家属,诀别亲人而奔赴战场的。所以这些农民和庶民,也就是象学生一样的所谓那些“出阵”的人们。

还有,虽然现在大学生的数字已大大增加,但在 1940 年前后那一时期,日本男子大学生的总数约为五万人,当时的人口约为一亿,就是说,约二千日本人之中只有一个大学生。特别是,从当时全国二十岁左右的同龄青年所占比例来看,大体占一亿人口的一成,即有一千万人左右,而这一千万人之中,大学生不过约有五万人,竟然是二百个青年之中才仅有一个大学生。即,能够幸运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同龄人二百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其余的约一百九十九人,则是为生活而必须工作的劳动青年。这一俨然的事实,对于象我这样当时在校园里学习的学生来说,是不应忘记的,这可以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负疚”吧。

如前所述,我曾于1944年秋住进了马尼拉陆军医院,当时,恰值莱特岛大激战。从莱特岛前线接连不断送回来的伤兵和病人,因床位不够,让他们躺在担架上摆在走廊里,就这样他们纷纷死去。其中,也有已丧失意识,连自己的名字也说不出来的,是谁、什么地方的人都不知道,就那么死去了。当时,不由得使我想到,不久我的命运也是如此吧。对“无名士兵”那孤独的容貌,至今不能忘却。

那之前我一直听说,战死的士兵在最后都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可是象马尼拉那样的战争末期的战场上,没有一个士兵喊“天皇陛下万岁”的,他们最后所说的只有一句悲惨的话:“还有孩子哪,不能死啊!”当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喊着“天皇陛下万岁”悲壮而死的士兵为数不少吧。但是,那暂且不论,对使其如此之死的国家教育,我感到十分可怕。

说到马尼拉陆军医院,在我出院之后,那些不能出院的人,即随同医院一起转移到深山里的避暑地碧瑶。听说最后多达千名的伤者,通过注射空气或使用氰化钾等而“被处置”了。那些不分昼夜,在空袭之下为护理我们而辛勤奔忙的护士们,在国际法上她们是作为非战斗人员的,但听说也被迫“集体自杀”了。对尊贵的一个个生命,谁有权利下这样的命令?一想到这些事,我便感到无比愤慨,十分悲哀。

在劳动者、农民和学生之间,由于社会条件的原因,不光是存在上述的区别。在征兵制度上,大学、高中及专科生在毕业前予以缓征,享受这种差别性的特权。而到1943年10月,这一特权对法律、文学、经济等文科系的学生来说也被废止了。以没有缓征特权的一般劳动青年为主,超过30岁或40岁,抛开妻子,而被征集的累计720万以上的士兵,再说一遍,他们都是抛妻离子而被送到战场上去的,对这些士兵的应征,称“出征”,并不叫“出阵”,而只是把上述那种学生的1943年12月的征兵,称谓“学生出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只有在武士阶级奔赴战场时,才特别称“出阵”;一般下等人上战场是不叫“出阵”的。而当时,又将

1943 年 12 月对学生的征兵特别称作“学生出阵”，这是为什么呢？

我早就对“学生出阵”这个词，只对学生兵特殊使用，企图造成对学生进行奉承和煽动的效果，对这种“逆差别用语”感到不快。从《朝日新闻》的记者松井觉进氏那里我得到了一个复印的小册子，据此，对“学生出阵”这个词，用于何种目的，何时出台的，可以明白了。这本题为“学生出阵”的小册子，共 127 页，为日本海军报导部的高户显隆海军会计中尉所著。此高户会计中尉，在第一次对“学生临时征兵”时，于 1941 年 12 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提前毕业。该书卷首题有“国家今日切望学生诸君的一大勇猛之心与奋起”，内容是：(1) 从学校走向战场；(2) 亲眼所见三大海战；(3) 日美学生决战之秋；(4) 今日，青年学生奋起之时；[附]致海军预备学生。

第(2)部分所讲是他自海军会计学校出来后，成为驱逐舰的会计长的亲身体验，赤裸裸地描述了从 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海战，至 1943 年的南太平洋上的三次海战和航空战，是多么酷烈和危险；在第(3)部分，介绍了美国学生也积极加入空军的事实；在第(4)部分，强调在日本掌握高技术、成为第一线战斗力，非具有知识和教养的学生莫属：

如今正是青年学生拔剑而起的出阵之秋。连美国的大学生们，不也是乘着飞机，在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所罗门群岛的海域上飞来飞去吗！所谓我们之奋起，那只能是奋起乘上飞机，亲自去打击美英之敌。国家正存亡危急！当几千架敌机飞来把日本化为焦土时再奋起已经晚了。

册子里尽管没有使用“败北”一词，可是对战场上的惨淡情形和实质上的败北情况，有相当具体的叙述。当时日本海军竟把这类读物，向一般民众公开发行，可见当时的日本时局是何等紧迫。

并且，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以参加“学生出阵壮行会”的人们为首，可以说我们都没有认真而合理思考的余地，而是陷入了一种没有任何个人主体意志，丧失理性、丧失个性的集团主义的狂

热病之中。其后象“一亿玉碎”等提法,都表现了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那种不存在觉醒个性余地的、集团主义狂热病的气氛,则不能不痛感,失去了作为教育本质的人性、理性等的‘教育’;或是那样的‘宣传’;以及超国家主义的共同体性强制,是何等可怕。这一所谓‘学生出阵’的小册子,于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30日出版,由每日新闻社发行竟达7万册。当时在战时管制下对出版物发行数严格限制,这是破格发行的数量。在我们周围今天还存在着‘学生出阵’这个词的语源,竟是出自于此。

由上述可以明了,1943年前的日本的学生,可以说是在社会中占极少数的一个特权性的阶层。当时处于困境的军部当局,作为最后手段,为加速培养以航空战斗力为首的军事力量,而废除了对这些学生的缓征“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造出‘学生出阵’这个词,用封建时代武士阶级的语言,制造其与一般庶民出身的士兵之间的‘差别’来讨好学生,以此来加以煽动。对‘学生出阵’这个词,今天不可随便使用,这一点我想是可以明白的。

第三,因此,今天当使用‘学生出阵’这个词时,必须注意下述问题。对于因‘学生出阵’之名而被拉入军队的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便是潜在意识性的也罢,以此名义,一味地只顾表现自己悲剧性的牺牲来加以缅怀,或以此名义来召开集会等,似乎把它看作是自己朋友间的‘同窗会’,显出撒娇或独善,那是不成。

《朝日新闻》1993年1月20日晚报上,登载了加藤周一氏的《阳妄语》中题为短命的文章,其中说:

决定(出阵学生)一代人谁死谁生,与本人的意志、能力、行为等几乎没有关系,纯属偶然……生还者并不是因为值得生存才生还的。

与‘学生出阵’有关的这段话所道出的真谛,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与当时的劳动青年以及‘出阵学生’的无数阵亡者同为一代、而又幸存下来的人,真是感慨万分。

第四,今天,在此之前,我亦曾就‘学生出阵’发表过议论,如前

所述,“出阵学生”就学生本身也可以说是“被害者”,但却是被变成“加害者”的“被害者”。在我们所送到的战场上,则有完全是“被害者”的几亿之多的亚洲人。

现在在日本当人们谈及战争惨祸时,首当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被害;说到日本民众所受的惨祸,最多的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事,而且,其中也常常谈及“学生出阵”之事。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东亚、东南亚诸民族所受的痛苦和耻辱,真是难以估量。当时,被“强行掠走”或包括已经在日居住的朝鲜、中国各民族的人们在内,这些亚洲人饱受了殖民地统治乃至严酷的占领政策之苦。更为甚者,遭受战争的浩劫,人格被亵渎、被凌辱,乃至被残杀致死。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谓“出阵学生”,实则充当了帮凶,沾污了双手,是负有责任的人,对此,如今是绝不可忘记的。

然而,在战后,我却遇到一场战后政治中枢部的人演出的令人吃惊的“大闹剧”。恐怕包含其本人也是“学生出阵”经历者在内的47名众参两院议员,举行了一次集会。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见于1978年4月12日的《每日新闻》。据报道,4月11日晚,在东京赤坂的宪政纪念馆,由除共产党议员之外的各党出身海军的议员召开了超党派的“原海军军人俱乐部”的成立总会,配合着原军号手的军号,“对舰旗敬礼”,“向英灵默哀”之后,“令人怀念!”“令人怀念!”在一片颂扬旧海军的喧闹声中干杯,全体“演唱军歌”,大喊大叫,喧嚣不已。

我对这场“大闹剧”感到极大愤慨,曾在《历史评论》第三四号(1978年8月)上写了题为《战争体验与历史经验》的文章,其后该文收于私人版的《战中战后》一书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作了如下批判:

对这47位“选良”日语“选良”一词本指国会议员——译者以议员们来说,其所谓完全是“怀念”的“战争体验”,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他们每个人的“战争体验”,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体验”呢?例如,把早乙女胜元氏的《东京大空袭——昭和二十年三月

十日的记录》(岩波新书)一书中所收录的庶民的无数悲惨的空袭体验,称为“令人怀念的”战争体验,到底谁能做到呢?

第二,他们47人感到“令人怀念”的“战争体验”,说到底,即使是原将校或原水兵也罢,都不过是被现在“选良”大员们的美化了的“回想”而已。

第三,那些“选良”大员对“战争体验”的认识,也不过是象“演唱军歌”那样,如此简单粗俗。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原将校们是把自己个人的“体验”,当年那种恣意放肆的实际感受原封不动地留下来,或是将其淡忘了,或是基于某种社会性的打算故意将其忘却乃至歪曲。而关于“战争体验”的意义及其本质,则不进行任何思索,表明了这些政治家或政治流氓的战后生活,是何等堕落。

最后,对“向英灵默哀”一事我当然不能疏忽。“默哀”,本是与别人的内心世界相关之行为,若逾矩判断加以推测的话,我则不能不认为,他们的“默哀”,并不是通过对那种各自所熟知的重要亲人名有姓的某某牺牲者的追悼,进而对所有的战争牺牲者进行普遍痛切的哀悼,而只不过是面向没有实体的“英灵一般”的抽象,按规定走走过场,仅是这种场合的免罪符性的“默哀”。何以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在“默哀”完了之后,还伴随酒与军歌大吵大闹了一番。

在这些“选良”大员们的“向英灵默哀”之中,抹杀了一个个“英灵”的“人格尊严”,我所看到的,只是这种颓废了的虚无。

以上,即是我所作的批判,而这,也是作为“出阵学生”的我日日所必须反省的。

对此,我又想起了有一次在NHK电视上看到的情景。一个作为战犯服刑期满而归还的日本东北的老农民,把在中国的监狱里写下的一个《反省录》让NHK的记者看,并说道:“这的确是我写的。我杀过中国人。尽管是在长官的命令下干的,可杀人是我。”应负“责任”的主体,通常是个人的人格。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士兵,能正视事实,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赎罪。与此相比,不禁使我感到,在战后现代的日本,如刚才举出的一伙政治家们那样,不光是沉湎于忘却事实,甚至进而出言美化,这种历史的捏造者,真是太多了!

只有一个哥哥,以“学生出阵”被送到军队里,因战争而丧了命的中国史研究者柳田节子先生,最近自费出版了《作为“海底之声”一代活着》(1992年)一书,在其收录的《作为“海底之声”一代的一个遗属》一文中,就有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举出了学生公然说出的“打起仗来杀人是当然的”的答案,发表了下述议论:

一般认为,在全世界战争中的牺牲者达几千万。那些人在死的时候是怎样想的,又给遗留下来的家属带来怎样的悲痛和不幸,这个学生好象没有想到。我,是作为“‘海底之声’一代妹妹”的一个人在战后活下来的。我唯一的哥哥、对父母来说唯一的儿子被国家夺去了生命……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被强迫夺去生命,那是多么残酷啊!而且,一个人死去,又给其遗属每个人带来多么大的创伤,对此,无论如何要请大家想一想。

有一年8月25日,即巴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纪念日,我正好在那里旅居。这一天,巴黎无论在街角、公园,还是塞纳河畔,到处都可看见,在小小纪念碑前,都献有花束。那些纪念碑上都刻着被纳粹处死的抵抗运动的牺牲者的名字和年龄,象我这样过路的旅行者也可知晓:啊,巴黎的居民是和这些人一起居住的!

还有,在英国的剑桥大街,有一座使用了昔日客栈那样的小旅馆而筹办的民俗博物馆,我常常午后散步光顾那里。其中一个展室,为悼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青年,摆了母亲或妻子、妹妹等把战死者名字绣于其上的手帕等纪念物。那一件件纪念物旁还附有写着刺绣妇女名字的卡片。这些妇女,对我这样的参观者来说是从不相识的,或她们本人也许已成故人。但是,参观者站在这些不相识妇女们制作的褪了色的刺绣物面前,不禁感慨。那悼念亲人之死的妇女们的悲痛,在这里一直存在,或者,即使在她们死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我认为,对那些曾经一定有自己的名字、思念和愿望,定有自己美好人生的战争牺牲者的每个人,致以哀悼,献上安魂祝愿,进而把这种祝愿献给国内外未知的,甚至是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那无

数‘无名’的牺牲者，若是我们战后没有这种真挚的生活，没有这种思想，那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历史认识则不成立，因而，作为人的学问，真正的历史学也不成立。

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先生在《听吧！海底之声》一书初版所收的文章中，于战败之后不久的1949年，即呼吁：

我想请所有的日本人，特别是请那些把最近的战争忘得一干二净的人们，请满不在乎一心搞争权夺利的政治家，请讴歌文化生活的绅士淑女，请热衷于深远学理的大学教授，请受令挥舞白棍长竿的警官，请一边挥舞红旗喊着“人民驾到”一边冲向法院的那群人，请除了娱乐杂志以外别的什么书都不看的实业家，请孩童时代曾“举着枫叶般的小手”、喊过“士兵万岁”的当今年轻的学生诸君，……读一读这本书。

前文，讲了我自己对战争牺牲者的“负疚”，同时也谈了作为牺牲者的死是决不应该发生的。那么，以“出阵学生”为首，关于日本士兵的死，他们的死具有什么意义？是否也应考虑一下呢？这里有必要提出这一问题。

我在战后的五十年里，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所谓和平集会。今天，这样的人已经减少了。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所谓特攻队的遗属面前，竟有人随便地说：“特攻队是白送死”。我一直认为，这种人不懂得人，因而也不懂得历史的真实之处。

这里，我想再从刚才提到的柳田先生的著作中谈到的说起。当时，柳田先生的哥哥柳田阳一氏，是在一次演习事故中死的。有一天，由同一事故而死的另一个牺牲者的哥哥K氏，相隔了三十几年后前来造访。K氏对自己的弟弟被作为“病死对待”一事非常愤慨，为弟弟作为“战伤死对待”和安放到靖国神社合祭而奔走，得到解决。K氏谈了自己解决此事的经验，并对柳田先生说：“若是不安放到靖国神社里祭祀，阳一君就不能超度成佛了呀！就象现在这样，那可真是白死啊！”

柳田先生对在战败后仍支持天皇制的这一庶民说道：“不管怎

么做都是白白送死的。使死者再生之路,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对让年轻的生命去白白送死的要痛恨,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柳田先生本人对自己亲兄弟的死,如此而言;那么,完全是别人,满不在乎地信口说“那是白白送死”什么的,又将怎样呢?若装作自己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许问题到此就结束了。而我认为,关于对人和历史的深刻认识问题,正在于此。

其实,我在战争末期由菲律宾转到台湾,直到战败,一直在台湾的台北机场服役。每天送走向冲绳战场出发的“特攻队”,便成了我们的日常业务。在这种飞机场,人的所谓尊严,是怎样被当作东西来对待,我真是体验够了。那些“特攻队”,是不装上飞回程的汽油就命令他们出发的。这种残酷对待,如此“人的物化”,到底要创导什么呢?对自己和他人,都让人觉得真受不了,愤然至极。

基于此种经历,与柳田先生一样,我也曾在《历史像再构成之课题——历史学的方法与亚洲》(1966年)一书中写了《亚洲研究方面的感性与论理》的文章,其中,包括特攻队的阵亡者,关于战亡者论述如下:

战亡了的士兵们的生命,并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具有尊严性的“意义”。但是,毋庸置疑,由此即直接得出,也不能认为让他们丧失生命者是无意义的结论,这种逻辑的飞跃是不允许的。他们死的“意义”之深,当然不应看得如此简单……首先必须确认,他们的生命是任何东西都很难代替的,正因为具有这种“意义”;所以他们的死只能是“无意义”的。必须首先对使他们致死的侵略战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批判。

可是,今天在战后的风潮中,并不是对特攻队员每个人的死表示悲痛,而是笼统地把他们作为“英雄对待”,或为了自我保身,或为了宣传、维护自己党派的立场。如此玩弄人的尊严是绝不允许的。——这,就是通过战争体验使我痛感到的真实。

而这,不止是日本士兵的牺牲问题。在新加坡日军长期惨杀华侨方面,有打、踢、摔等拷问方式,称为“柔术”;从直肠和口里往肚

子里灌水,等肚子胀起来后,日本兵就往上一跳,水便从眼、耳、口等处象喷泉一样喷出,这种拷问,被称为“东京洋酒攻”。据说这种方法,由日军组织传给了1945年2月在马尼拉方面的日军。

一般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中被侵略的亚洲各国牺牲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其大概数字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有以华侨为首的五至七万人;中国有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印度支那有二百万人以上,其中越南新宪法的前言即写有:在日军的占领下饿死了二百万人;菲律宾有一百零五万人以上;印度尼西亚有二百万人;缅甸有五万人;印度有三百五十万人以上。

而且,1944年对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民族,1945年1月对处于同样地位的台湾岛民,都下达了征兵令,这些人作为士兵,或为随军属员,被编进了殖民地统治者的军队,成为对亚洲各民族的侵略者的一翼而战死,有的甚至成了“战争罪犯”。

因此必须说,我们战争体验者在其战后生活方面,对国内外的、亚洲的、乃至整个地球上的战争牺牲者,是负有安魂之义务与使命的。

说到此,我想在战后出生的年轻的诸位之中,当然会有这样想的:“因为我跟侵略战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与己无关,所以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论述历史,并不是把过去仅仅作为过去来论述。我们在通过亚洲、太平洋战争论述战争问题时,战后的我们既回顾过去,同时,又思考现代我们自身的问题。这,即是历史意识,历史性地思考,所谓历史学的考察,便是这样的工作。

著有《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一书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我并不是就古代来谈古代。在近代,则是为了近代来谈古代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所谓历史,是按现代重写的。”(《历史叙述的理论与历史》1915年)还有,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在西德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四十周年的联邦议会演说中亦说:“对历史采取傲慢的态度,是不允许的”;“不反省历史,就没有未来”。

他们均认为,历史不单单是过去的事情,所谓历史认识,乃是依据现代活的现实而形成的。

就讲述战争体验一事而言,只有通过战后我们的生活,通过走向和平本身的实践,才有可能谈深刻的真实的历史认识。还有,已死在战场上而连遗骨尚未归还的士兵们,及所谓“中国残留(实际上是遗弃或遗留)孤儿”——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规是,对战败当时未满十三岁者,称为“残留孤儿”,纳入援助对象;而对当时十三岁以上的人,则视为“依据自己的意志留下的人”,今天仍被排除在援助对象之外。因此,侨居黑龙江省的老妇人等,由于山口县志愿者的援助,才有可能临时回国——还有“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等——石原慎太郎氏的《“南京大屠杀”——抵制对历史的篡改》(载《诸君!》1994年7月号)一文主张,“为确定‘南京大屠杀’的有无,通过组织日中共同调查委员会,调查被害者的数字吧!”这与这次阪神大震灾不同,当阪神大地震发生之后,周围地方团体的人们,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牺牲者极为关注,想方设法进行救援,因而在不断搞清楚牺牲者的数字和姓名,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无差别杀人,或大屠杀,本来就是加害者有意识地蹂躏人,对人性进行凌辱和抹杀,既然如此,牺牲者的姓名自不必说,就是确定其牺牲者数字,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日本人事前不进行反省和认罪,就对中国人方面呼吁“共同调查”等,这件事本身是何等失礼!对此,石原氏是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假装不知道吧。现在,当我们想到和反省过去的战争时,若是谈战争体验,谈战争,如果不基于这种反省,上述这些国内外的几千万的战争牺牲者,恐怕是决不允许的,决不允许我们这样来“谈战争”的。这正是通过我自身的战争体验,从战争牺牲者那里得到的“感受”,也是我所确信的有关的历史认识。

谈起“责任”,并不应由军国主义啦,军阀啦这种抽象物来负的,本应由每个人的人格直接来负。既然如此,可以说战后代

者,了解战争一事,是与今天的生活结合起来而思考的,是思考今天的生活。而且,作为必然要继承战前以来的日本的历史与文化而成长起来的战后一代年轻人,在其中进行深刻的思索并付诸行动,也可能对过去的战争持有深刻的历史认识。

试具体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在前几年,据报道,日本政府为把钚运到日本,付出了 230 亿日元的财政支出。而且据说,因不久将走向 21 世纪,日本的原子能发电所将由 1993 年当时的 17 所电站、47 座原子反应堆,增加到 80 座原子反应堆。这样一来,在日本国土之中,到处都是原子能发电站,从地区利己主义来说,即便是在福井县敦贺发生了原子能事故,恐怕也不能说不影响到东京周围。并且,在现代社会这种经济增长之中,对所有的尖端技术,若不到一百年、二百年后,是无法测定其结果,得出结论的,我们是在诸多的反复试验、不断摸索之中生活的。促使这样做的又是什么呢?那正是在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和日常生活方便的思想——实际上是无思想——的支配下,一个劲地盲目突进的做法。于是其结果,人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人性被无视,被蔑视。

关于原子能、或原子能发电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而成为当今的重要问题令人思考。我们若是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痛恨至极,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与原子能、或原子能发电的问题联系起来呢?

进一步说,我们若是悼念广岛和长崎各 25 万人的牺牲者的话,还有,对那些说着“给点水吧!”而被杀掉的人们的声音,我们日本人若是能在心中听到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想到由日本人所进行的同样的杀戮或屠杀,而在东亚、东南亚造成的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牺牲者呢?从悼念有名有姓的一个人一个人开始,如此再扩展时间和空间进行思考,将其弄明白,这就是历史意识,就是历史认识本身的课题。

战败后,化为焦土的日本经济,其复兴契机,是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出现的军需景气。日本经济,是由朝鲜人、越南人的牺

牲才开始走向如此惊人的经济大国之路的。然而,被强行掠走、随着战败而由日本政府遗弃下来的、萨哈林岛的 43000 人的在留韩国人——当时在留韩国人之所以未能回国,是由于当时苏联与韩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只有通过日本才能回国,而据 1947 年 5 月 2 日的《帝国宪法》最后的第二百零七号 敕令》,说他们已经不是日本人了,以此为理由,日本政府不予通过——的问题仍未解决。还有,关于为从事煤矿坑道的残酷劳动而被强制掠到日本,大量死亡的中国人、朝鲜人等的问题,关于被带到广大的东亚、东南亚前线,作为日本军人发泄性欲手段的,战后被抛弃不管的“从军慰安妇”——这一叫法实际上是极不礼貌的侮辱性的语言,作为当时的历史性事实的用语,现在不得不继续使用,而对此的反省,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能看到吗?——的补偿问题,据说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是,用缔结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是,在战争期间,“慰安所”以及“从军慰安妇”乃是在日本政府及日本军的管理之下而运营的,基于这一历史事实资料,直到最近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然而,却又主张,“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已经由于 1965 年的国家间的《日韩基本条约》业已解决。所以我不禁在想,日本政府的这种基本方针、基本见解,到底是如何得以成立的呢?实际上在处理怠慢、故意拖延之中,她们就全死掉了,问题不就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吗?如此将其作为搁置一边不管的“风化政策”来考虑,骨子里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而且,在这里不是隐藏着一种对亚洲诸民族的“差别”对待吗?这种所谓“差别”,在侮辱对方人格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人性的最大侮辱。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颓废的虚无的政治。

前年,细川总理访问韩国,在与金泳三总统会谈后会见记者。日本的报社记者曾问:“慰安妇问题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恐怕是仅仅考虑事务性、政治性地解决,搞点政治谈判,处理一下补偿问题什么的吧。是否让人觉得不首先进行彻底的自我反省,对方一说“不要补偿了”,这么就解决了呢?若不是这样的问题,作为人的内

心世界方面的问题、思想问题, 我们战后的生存方式岂不存在问题?

最后还想说一句话。我在战场上曾如此切身痛感: 日本自明治以来竟一直在进行这种教育啊! 即, 不培养个人的自由的主体性和批判能力的“教育”, 该有多么可怕。其结果, “天皇”名字是万能的, 它造就了连跟家属也不进行最后告别、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人。这就是日本的教育。我在战后从事了四十多年的教育工作, 也勉强算得上一个教育工作者, 对教育的力量, 其可怕性, 不能不有深切的感受。

再者, 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的柳田先生, 象其在《作为“海底之声”一代活着》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必须有人性的深刻悲痛和反省, 而且要有“思想”, 对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我要说, 若不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 作为人的学问的历史学就不成立。

(译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兵)